

2019年第9期(总第9期)

# 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动态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STUDIES  
REVIEW

俄罗斯军事思想:概念与要素  
国际战略安全研究领域新论点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 一、俄罗斯军事思想：概念与要素

2019年8月，美国迈特公司发布报告《俄罗斯军事思想：概念与要素》，该报告从军事传统与信息科技进步两个角度分析了俄罗斯军事思想，为了解俄罗斯军事思想提供参考。一方面，对当今仍在流行的几个苏联时代军事概念进行了研究，如战争的形式与方法、战争预测、战争初始阶段等。另一方面，报告研究了如何用传统概念来理解科技进步且新武器层出不穷的作战背景。例如，用传统军事概念“形式与方法”来研究太空防御、网络安全以及以网络为中心的作战条件等问题。

作者称编撰报告有两个重要目的：一是让西方分析人士了解俄罗斯军事思想，认识到俄罗斯与西方军事思想的差异；二是证明使用西方军事概念来分析俄罗斯军事思想很容易造成理解错误。俄罗斯军事思想中使用西方军事概念较少，即使确有使用，其含义也不尽相同，而且很可能已被附加了其他含义。正因为许多西方分析人士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许多对俄罗斯军事思想的理解都被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西方分析人士对军事思想的研究聚焦于混合战、灰色地带战争、多领域作战、反介入/区域拒止与C4ISR等概念上，但将这些概念生搬硬套到俄罗斯军事思想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报告详细分析了俄罗斯军事思想中几个特有的概念，例如瓦解并迅速控制敌军，创新性实现作战构想等。还分析了间接与非对称战争一类非俄军特有的概念，但其他国家均按照自身具体情况分析并实现这些概念，与俄罗斯的情况有很大区别。同时，俄罗斯正在重新研究与定义许多军事概念，其中包括最基本的概念——战争。这是因为随

随着科技发展，战争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如网络战可通过特种行动使一国指挥控制力量与重要基础设施瘫痪。在这种情况下，“战争”这一概念的确需要被重新研究与定义。

此外，过去 20 年，俄军在车臣、乌克兰以及叙利亚开展作战行动后进行了经验总结，俄罗斯军事思想也在实战中不断得到进化。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强调，不仅要从俄罗斯参与的军事行动中吸取教训，还要从西方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展开的行动中吸取教训。并且，随着信息时代科技迅速发展，俄罗斯军工界已经发展出新的电子战能力，不仅能对俄罗斯的指挥控制能力提供有力保护，还能设法削弱外国的指挥控制能力。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称，先进的新武器为实现作战构想的思考方式提供了新动力，他强调不能将战争的概念刻板化。

在分章讨论中，第一章进行了背景介绍。第二章“俄罗斯军事思想：承前启后赢得未来高科技冲突”对苏联和俄罗斯军事思想进行了类比研究，并认为需要防止观念僵化，并注意培养俄罗斯军官的创造性思维。第三章“俄罗斯军事艺术与创造性运用知识”重点阐述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强调军事艺术需随着新武器发展而不断进化。例如，使用电子战或网络战能力可以削弱对手的系统，从而改变双方力量的相互关系。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发展也为提升军事能力提供了无限可能。第四章“俄罗斯自反控制理论：操纵对手使之对自己有利”讨论了多年来这一理论在实战中的应用。作为一种欺骗敌军的方法，自反控制理论不仅可被运用在战场上，还能被用于网络和信息作战中。第五章“俄罗斯的不对称概念：基于军事艺术、地缘政治和风险应对”讨论了运用智力与技术优势，发现对手系统中可能产生战术甚至战略后果的弱点。第六章“将 GPS 干扰与俄罗斯的反介入 / 区域拒止概念联系起来”讨论了俄罗斯对瓦解敌军指挥控制能力的关注。在俄军看来，瓦解敌军指挥控制能力与俄罗斯反介入 / 区域拒止能力同样重要。

第七章“俄罗斯网络信息问题的背景”讨论了战争初期的重要性、俄罗斯网络规划者的担忧，还简要讨论了网络“致命武器”以及如何在网络战中运用自反控制理论。第八章“电子、海底电缆、卫星与创造性思维：俄军的信息环境”研究了信息领域中无形且极难被可靠预测的具体要素。第九章“俄罗斯军方讨论战争的定义”探讨了2017年来俄军就“战争”这一概念开展的讨论。第十章“俄罗斯对未来战争的预测”讨论了俄罗斯将如何继续定期更新其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预测。战争性质的变化，由科技推动的武器更新以及战争的新趋势（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等因素都是这些定期更新的动因。第十一章“俄罗斯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塑造俄罗斯的武装力量和军事思想”简要介绍拉西莫夫的军事生涯，并罗列了他接受媒体采访内容与在军事科学院作报告的内容。第十二章“结论”总结了讨论结果，并列出了俄罗斯军事机构使用的一系列优先考虑事项和参照标准。

报告认为，俄罗斯军事思想是综合了远见、欺诈、威慑、绝对实力、创新思想、备战状态以及复盘分析的复杂混合体。远见这一因素深刻影响着俄罗斯对确保战争初期优势地位的重视。欺骗包括自反控制以及其他通过法律、信息、展示等手段来遏制或恐吓对手的威慑措施。实力体现在俄罗斯军工联合体的强大能力上，该联合体生产核力量并研发新型武器，还提升着俄军打击对手核心要害的能力。创新体现在对俄军对军事艺术的创新应用中，还体现在其瓦解敌军信息能力与指挥控制能力中。备战状态受到苏联历史和俄罗斯军事存在的影响，从多年传承下来对战争初期的重视，到今天从外国军事行动吸取的教训都从某种程度上培养了俄军对备战的重视。

文献来源：迈特公司分析师，美军欧洲司令部信息战专家蒂莫西·托马斯2019年8月发布《俄罗斯军事思想：概念与要素》。  
<https://www.mitre.org/publications/technical-papers/russian-military-thought-concepts-and-elements>。

## 二、国际战略安全研究领域新论点

1、美对华“决战”姿态渐成全社会共识。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罗伯特·萨特认为，由于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上都出现似将盖过美国之势，美国两党、政府国会、官方民间等都已产生不能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坚决意志。在行动方面，由司法部、FBI对中国在美活动进行调查，国防部、CIA在海外实施监视；舆论方面，主流媒体已由抨击特朗普转为加强中国是美重大威胁的传播；民众方面，近一年来已建立起中国借不公正经济操作对其生活造成恶劣影响的认识，基督教福音派因中国打压宗教产生反华情绪。美主要智库的中国研究目前也极为活跃，大多得出中国从美方掠夺技术和知识、以各种方式削弱美国的结论。美当前对华强硬政策的目标是迫使中国放弃利用其实力削弱美国的攻势。美对华遏制政策将长时间持续，但推行强硬政策也将对美造成巨大损失。美尚未就损失规模和金额进行具体计算，若发现损失规模整体权衡下对美不利，相关方可能得出对华竞争到此为止的结论。

战略和预算分析中心（CSBA）高级研究员吉原恒淑认为，在遏制中国已成跨党派共识的前提下，美应对华确立强硬的政策方案。在意识形态方面，两国之间是民主与专制的对立，由此出发，应将中国清楚界定为敌对国，并采取挑战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行动。针对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行动，美应该采取水平升级的对抗手段，不直接还击，而是在其他领域实施报复。如北京打压香港，美国就扩大对台湾的援助；北京压迫维吾尔族人，美国就增加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支持。

美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委员拉里·伍尔泽认为，眼下美必须在军事层面打压中国。伍尔泽在实地参访中国后得出结论称，中国领导人稳固的执政基础来自于国有企业高管和各地方行政首长。

特朗普政府要求中国停止国家对企业提供补贴，无异于削弱国企和省级直属企业的竞争力，动摇支撑中国体制的国家经济体系，因此中国不可能轻易答应美方的要求。

——日本《正论》月刊11月号发表《产经新闻》驻华盛顿客座记者古森义久的文章《美中对立的深层解读》。

2、美中战略竞争领域正在扩大。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扩大，其国际行为对美国利益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美中关系的范围。中国扩大影响力的范围不仅在军事方面，也在其他政策领域推动战略竞争，美对此必须加深了解并调整战略。迈克尔·奥汉隆认为，在应对来自中国的“灰色地带”挑战方面，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制定不对称防御战略，重视经济战的作用。凯特琳·塔尔梅奇称，美国不太可能避免与中国展开核竞争，为应对这种竞争并降低核升级风险，应重视直接的危机沟通渠道，可将中国纳入一个涵盖网络、太空及其他影响核稳定的前沿技术的军备控制框架。关于中国在非洲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杜大伟称美国及其盟友应更多关注项目效益，同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额外资源，帮助发展中国家管理借贷和改善预算管理，世界银行及其他借贷机构应缩短贷款办理时间，提供比中国贷款更具竞争力的方案。丹尼尔·拜曼和伊丝拉·萨比尔称，随着中国扩大其海外存在，它很可能会成为恐怖组织的打击目标，但中国似乎在反恐领域并没有做好准备。理查德·奈菲尤建议美中考虑就制裁问题进行双边磋商，美应将制裁纳入应急计划中，并加强美国关于中国制裁理论和实践的情报及分析能力。李成评估最近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决策，得出结论称中国已崛起为全球大国，不应低估在中国国内的力量和民众对外交政策的支持。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9月发表该智库研究员塔伦·查布拉、拉什·多希与何瑞恩、副主席行政助理埃米莉·金博尔的报告《全球化的

中国：战略竞争领域和国内驱动因素》。<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global-china-domains-of-strategic-competition-and-domestic-drivers/>。

3、竞争与合作并存是中美关系最好结果。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讨论应该超越“鸽派”、“鹰派”的简单划分，竞争与合作并存是中美关系最好的结果。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一种单一的、激进的政策转变都将带来巨大的风险。今年7月以来，美国国内有两份文件值得关注，其中一份是百名政策、军事、商业和学术界人士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公开信，另一份是哈佛大学的江忆恩在《华盛顿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公开信的发表表明，对美国而言，管控中国崛起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战略挑战。简单地将中国划为敌人，采取保护主义的方法减少与中国经济和技术上的相互依赖，只会带来矫枉过正的风险。约翰斯顿的论文则更明确地指出，采取对华遏制战略并不会阻碍中国最终实现复兴，中国的市场潜力、制造能力、历史适应能力都决定了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美国采取对华遏制战略只会逼迫中国迅速成为其竞争对手。中美两国最紧迫的事情之一就是保持一种既能保证商业利益又能降低安全风险的相互依存关系。相比不受约束的对抗，竞争与合作并存是中美关系最好的结果。

——兰德公司政策分析师阿里·韦恩9月20日发表在该公司网站上的文章《超越鹰派和鸽派：辩论美中政策的更好方式》。<https://www.rand.org/blog/2019/09/beyond-hawks-and-doves-a-better-way-to-debate-us-china.html>。

4、战后由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即将解体。二战后形成的东亚秩序正走向终结：中国已成为东亚的主要经济角色，正在发展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军力；日本一直努力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增强军事



实力；韩国最近取消了与日本的情报共享协议，而这份协议是美敦促其两个东亚盟友开展三边合作的基石。特朗普在东亚三个主要目标进一步加速了这一秩序的终结：对华发起贸易战；敦促盟国多出钱来分担驻外美军支出；与朝鲜和谈却完全没有将其放在东亚其他各国的需求中总体考量。美国在东亚影响力式微，适逢民族主义强势复苏，中日韩政府都出现这种倾向，最明显的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这进一步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加速了该地区的军备竞赛。

——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9月24日发表该计划主任约翰·费弗的文章《东亚秩序的坍塌》。<https://fpif.org/the-collapse-of-the-east-asian-order/>。

**5、美中竞争将决定亚洲命运。**亚洲的未来有三种主要可能性：第一，中国继续迅速崛起，美国陷入困境。这样美国将很难保持目前在亚洲的安全地位。即使美国不再提供支持，亚洲各国也有可能联合起来应对中国，但是除非印度能跟上中国发展，否则仅限于亚洲的制衡联盟仍无法有效牵制中国。第二，中国陷入困境，美国保持领导地位。这种情况下，亚洲大多数国家将成为“地区平衡者”，并寻求与美国保持密切的伙伴关系，以防范不确定性。第三，美中同步增长，但是差距缩小，世界处于两极或高度不平衡的多极状态。第三种目前可能性最大。这种情况下，亚洲大多数国家倾向于与美国斡旋，以继续牵制中国，同时从华盛顿获得足够的关注。然而当前特朗普政府并没有朝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努力。撕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挑起贸易战，在朝鲜问题上只为展现个人魅力，都不利于维持亚洲势力的均衡。要改变这种局面，美国的外交政策团队需要看到大局，确立重点，争取盟国的支持，并且要避免被高估的附庸国和地区牵扯过多注意力。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贝尔弗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董事会成员斯蒂芬·沃尔特9月5日发表在美国贝尔弗中心网站上的文章《亚洲有三种可能的未来》。<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asia-has-three-possible-futures>。

6、世界秩序陷入混乱且无任何国家愿担守卫责任。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在近20年的单极秩序中扮演着全球秩序守护者的角色，但代价高昂，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拒绝继续扮演这一角色。人们曾长期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但中国至今还无法也没有强烈意愿取代美国成为国际秩序守护者。欧洲评价发展进程，但并不干预，只是扮演着观察者和提醒者的角色。虽然当前新的世界秩序轮廓尚不清晰，但在新的全球秩序中军备水平将明显更高，或许还有一系列新的核强国出现。这将是世界秩序没有守护者的代价。

——德国政治学家、柏林洪堡大学政治理论教授赫弗里德·蒙克勒8月21日发表在德国《每日镜报》网站上的文章《世界需要一个秩序大国，但却没有》。<https://www.tagesspiegel.de/kultur/krisen-kriege-und-konflikte-die-welt-braucht-eine-ordnungsmacht-doch-die-fehlt/24923844.html>。

7、美及其盟友需制定不对称防御和反击战略。美国国家安全界现把关注点放在与俄罗斯或中国开战的风险上，以此作为防务政策和资源分配的重中之重。如果俄罗斯或中国发动小规模但具有潜在战略影响的袭击，按照现行策略，美国很可能对此反应过度。美及其盟友需制定不对称防御和反击战略。不对称防御将经济手段与战争结合融入作战计划。在应对来自中国的“灰色地带”挑战方面，不对称防御中的经济战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美现行军事策略也不应被放弃，因其仍有威慑作用并能安抚盟友，或许还会支持实施经济制裁。不对称

防御战略的具体政策调整包括以下七方面：第一，全面改革研究与规划，美国国防部在制定一体化经济-军事战争计划方面，应向其他机构寻求帮助；第二，加强经济战教育；第三，确保能源和矿产储备，美国战略性矿藏规模应恢复到冷战时期水平；第四，优先考虑远程打击平台；第五，创新非致命性武器，尤其是在某些冲突情况下可能干扰海上航运的武器；第六，保持传统军事能力；第七，重新审视经济工具和经济脆弱性，在对金融交易过度使用制裁方面需谨慎。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9月发表该智库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隆的报告《中国“灰色地带”和美国国防部及其他机构的应急计划》。<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china-the-gray-zone-and-contingency-planning-at-the-department-of-defense-and-beyond/>。

**8、五角大楼应进行技术开发以保持军事系统竞争优势。**军事系统落后的问题部分源于五角大楼越来越依赖外部公司，不再采取自己的开发方针，因而无法取得曾经让美国军事技术保持领先的重大飞跃。此外，五角大楼在获取外部系统时不重视灵活性和实用性，现在不得不处理与之相关的安全风险问题。五角大楼现在需要改进的系统清单与中国和俄罗斯的优势列表相似，一个解决方案是五角大楼对技术进行更多的内部开发，采用软件优先的方法设计系统，还必须改进其研发规划流程，以便在系统失去作用或被赶超之前，将基础研究更快地转化为行动。美国军方应该领导创新复兴，而如今五角大楼正在沦为技术领域里一个单纯的客户。如能重振军事技术组合和更积极地运用灵活的采购规则，会有助于重新获得美国所失去的部分创新优势。

——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麦肯齐·伊戈伦9月4日发表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上的文章《五角大楼应率先开发技术》。<https://www.wsj.com/articles/pentagon-should-take-the-lead-on-tech-11567636730>。

9、俄中共建导弹袭击预警系统对双方都意义重大。随着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不得不寻求应对美行动的各类方案。俄罗斯与中国分享导弹预警技术具有特殊意义。首先，俄助力中国打造导弹袭击预警系统，不仅会提升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军力，还彰显了两国合作的战略性质。其次，一旦导弹袭击预警系统建成，美将失去对华发动突然核打击的机会。这意味着中国将能及时予以导弹核还击，这将有助于稳定国际局势。最后，合作对俄的重要性在于，一旦建立起统一信息空间并与中国共享雷达数据，能够更好地保障俄罗斯纵深地带的安全。中俄共建导弹袭击预警系统对中俄双方都意义重大。

——俄罗斯《观点报》网站10月4日发表阿列克谢·涅恰耶夫的文章《俄罗斯为何要保卫中国》。<https://vz.ru/world/2019/10/4/1001276.html>。

10、长远看应让中国参与到美主导的军控体系内。鉴于中国不断发展战略能力，尤其是反卫星和进攻性网络能力，特朗普政府最近提出的将中国纳入未来军备控制和战略稳定框架的建议在战略上是合理的。然而，让中国加入《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不现实的。美需要着手在更长期的范围内把中国纳入未来的体系，尤其是在新兴技术方面。与中国接触需要威慑和对话的结合。在威慑方面，首先，美必须推进其战略核力量及其辅助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其次，美及其盟友必须加强外太空、网络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复原力。第三，美必须通过开发和部署额外的空中和海上打击系统来提高其在亚太地区的常规打击能力。第四，美必须加强其联盟的凝聚力。此外，美也必须对中国对话持开放态度，包括与中国举行双边战略稳定会谈；制定双边发射前导弹通知制度；邀请中国观摩《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审查；建立美国减少核危险中心与中国类似机构之间的联系；就外层空间双边空间准则进行谈判；与中俄举行三边战略稳定磋商，或与联合国安

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举行更广泛的会谈。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9月25日发表该学会高级研究员弗兰克·罗斯的文章《在军控和战略稳定问题上让中国参与进来》。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9/09/25/bringing-china-into-the-fold-on-arms-control-and-strategic-stability-issues/>。

11、特朗普对朝鲜的绥靖政策正在失败。2018年6月以来，特朗普与金正恩已举行过三次会晤，但却一直在把美国对朝政策引向错误方向。当前美朝似乎都已各取所需：特朗普制造了一个可能维持到2020年大选前的松散僵局以保护其“标志性外交成就”，朝鲜则以暂停核试验换得美韩暂停联合军演。目前的“双暂停”局面，一方面削弱了美韩联盟，一方面朝鲜无核化仍无进展。特朗普的团队陷入混乱，意识到迫在眉睫的政策失败，但特朗普没有表现出紧迫感。对他来说，只需要通过定期举行感觉良好的峰会来保持进展的表象即可。此外，美朝双方都对通过多边机制解决当前问题不感兴趣。朝鲜近期的试射和对韩国的行为可能意在警告特朗普，除非对朝鲜进行安抚，否则它将在美国大选前制造麻烦。特朗普可能希望世界认为他在朝鲜问题上保持战略耐心，但他对朝鲜采取的是绥靖政策。这项政策能否继续为他效力还有待观察。

——美国东亚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9月16日发表在《日本时报》网站上的文章《特朗普对朝鲜的绥靖政策正在失败》。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9/09/16/commentary/world-commentary/trumps-appeasement-north-korea-failing/#.XYBHdeszap0>。

12、欧盟须对中国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扩张采取行动。对中国而言，投资西巴尔干地区可通过该地区运输货物进入欧盟共同市

场，还可在有可能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国家获得经济立足点。尽管存在这种假定的利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促进西巴尔干地区国家加入欧盟的前景，反而对这一进程造成了不利影响。“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三种方式阻碍西方巴尔干 - 欧盟一体化：将各国拖入债务泥潭（所谓的“债务陷阱外交”）、降低环境标准和持续造成腐败。中国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存在增加是欧盟自己造成的权力真空的直接结果。西巴尔干一体化对欧盟核心利益和价值观至关重要，因此欧盟必须对中国的影响力扩张有所警惕。欧盟必须尽快采取必要行动，确保西巴尔干地区完全处于其势力范围内，否则中国将塑造该地区的未来。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9月25日发表美国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第八期中东欧区域研究室研究员奥斯汀·德勒的文章《中国如何在西巴尔干挑战欧盟？》。<https://thediplomat.com/2019/09/how-china-challenges-the-eu-in-the-western-balkans/>。

13、韩国应在美中之间保持谨慎平衡。美中战略竞争加剧之际，两国已不断向其他国家提出“选边站”问题，韩国正挣扎于美中“代理人竞争”之中。由近年形势看，2017年韩国同意采取“三不”立场（不追加部署“萨德”、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把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发展为军事同盟）后，中国针对“萨德”的制裁只显现较小变化；文在寅同年底的访华也在韩国国内备受批评，此后韩国对中国的好感有所减弱。2018年以来，韩中关系可描述为“不明确”。韩一直致力推进与朝鲜的和解，但该策略有三个问题：低估了朝鲜构成的威胁；高估了中国解决朝鲜难题的意愿；低估了韩美结盟的价值。然而，韩在朝鲜问题上态度仍与中国更为一致，韩国目前也不愿更多信任美国及其交易型总统。未来韩中关系须考虑三个问题：韩日争端将如何影响韩中关系；韩国如何在美中代理人竞争中保护自身主权；文在寅政府能否意识到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是避免被强大邻国欺负。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10月10日发表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学院教授、美中关系项目主任郑在镐(音)的文章《韩国的美中关系难题》。<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9/10/10/south-koreas-us-china-conundrum/>。

14、美不应将注意力从亚洲转回中东。特朗普政府在沙特遭受袭击后的谨慎回应是正确的，美国的军事中心不应从亚洲转移，应该确保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优势。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第一，伊朗的能力十分有限，无法对美国及其盟友产生致命威胁；第二，将军事重心重新转向中东将限制美国保卫其亚洲盟友和伙伴的能力，中国将取代美国制定亚洲规则进而制定世界规则；第三，由于对波斯湾石油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中东对美国的重要性正在下降；第四，美国可以通过为当地盟友提供军事能力应对当地恐怖主义的威胁，而无须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总之，美国的军事优势已大大削弱，无法在中东和亚太地区同时维持军事优势，美国必须降低其他地区事物的重要性，避免军事介入中东地区，以确保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射能力。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9月24日发表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埃尔布里奇·科尔比的文章《不要让伊朗分散对中国的注意力》。<https://www.wsj.com/articles/dont-let-iran-distract-from-china-11569366901>。

15、联合国须发挥积极作用防止大国冲突。当前美中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权力失衡，这种失衡让人想起冷战时的秩序。不同的是，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经济依存程度大大提高，已形成“两个体系、一个世界”。这种相互依存既是战略资产，也是不利因素，因为双方都可以通过使用供应链、金融结算系统和电信基础设施等全球网络武器化来谋求地缘政治利益。有两种发展方向可能会改变目前的局面：

一种是美中各自以一种在意识形态上走得更近的方式发展。2020 年大选后的新美国政府或将引领更具国际主义色彩的道路，而中国显著的经济进步可能会带来渐进式的政治自由化。另一种是一个更加一体化的欧盟可能会与中国和美国共同形成 G3，并在美中对抗中发挥重要的平衡作用。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实力很可能与美国和欧洲的总和相当。联合国在二战结束后成立时首先被视为基于规则的多边秩序的守护者，如今为防止新的、不同的，但同样危险的冷战，它必须再次致力于其创始使命。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土耳其前经济部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负责人凯末尔·德尔维什 9 月 11 日发表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上的文章《防止第二次冷战》。<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preventing-cold-war-ii/>。

本期责编：安刚、周武华

支持单位：参考消息报社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办公地点：清华大学明斋 217

联系电话：010-62771388

电子邮箱：ciss\_thu@163.com